

抗战初期武汉文学运动述略

□ 傅少瑾

内容摘要:抗战初期,全国性文艺团体、机构陆续在武汉成立,武汉成为全国文学中心。誓死抗战的决心,对胜利充满希望的乐观自信构成了抗战初期武汉文学的主流,小说、戏剧、诗歌、通讯、报告文学、特写等纷纷涌现,武汉抗战文学呈现多样性与时代性的新面貌。抗战初期的武汉文学,反帝的主题汇聚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更多地是反对汉奸,反对卖国投降。抗战爆发后,战争缩短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缩小了作家与人民群众的间隔,密切了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强化了文学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的意识形态功能。抗战初期武汉文学产生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的严峻时刻,文学要使普通民众和军队的兵士能看懂,必须尽量通俗化和大众化。武汉抗战文学,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民族文学。

关键词:抗战初期 文学运动 通俗文学

中国作家在抗战中热切关注抗战,积极投身抗战,创作大量表现抗战的文学作品。抗战文学热情歌颂中国官兵浴血奋战的爱国胸襟和牺牲精神,为表现抗战做出艰辛努力,甚至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取得丰硕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民族记忆。抗战时期,文学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的重要工具。在普通民众中通俗文学的影响最大,抗战的主要力量在农村,抗战文学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形成了抗战文学独有的特质。文学生产方式转变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和抗战初期“全民抗战”的主张相一致,作家将手中的笔作为唤醒民众的武器为抗战服务。“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实践成为抗战文学的主流。

武汉抗战是抗战初期一次全国动员的战役,是抗战由防御进入相持的转折点。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重要机构和军政要员的抵达,武汉成为抗战的临时首都。文学中心在形势危急中西移武汉,1938年的武汉几乎汇集了当时的主要作家,各类文化界人士达1000人以上。郭沫若抵武汉筹建政治部三厅,在武汉博物馆陈列有郭沫若当时在武汉穿过的衣服,在伊文思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就有郭沫若穿着这件衣服在武汉街头讲演的镜头。^[1]老舍到武汉后被推为抗战文学的核心人物之一,胡风到武汉筹备《七月》出

版及筹划举行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郁达夫、鲁彦、田汉、穆木天、阳翰笙、胡秋原、楼适夷、聂绀弩等纷纷到武汉,他们是武汉抗战时期文学的主力军。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学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全国文协”理事45人,有老舍、郭沫若、茅盾、成仿吾、巴金、张天翼、郑振铎、田汉、丁玲、冯玉祥、夏衍等。“全国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抗日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告成。成为文艺界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武汉抗战文学,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民族文学。文艺社团的繁盛,是武汉抗战文学运动欣欣向荣的一个突出标志。一大批全国性文艺组织的建立,有力地推动着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其影响遍及各地。作家云集,期刊荟萃,武汉抗战文学运动全面展开。全国性文艺团体、机构也陆续在武汉成立。1938年武汉成为全国文学中心。

抗战文学运动在武汉蓬勃兴起。当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后,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学运动,勃然兴起,如火如荼。为适应抗战需要,很多刊物在武汉创刊、复刊,如《七月》《战地》《抗战文艺》《自由中国》《抗战戏剧》《抗战漫画》《抗战歌曲》等都影响很大,大都坚持抗日立场,发表过数以千计的作品。^[2]

武汉抗战文学呈现多样性与

时代性的新面貌。誓死抗战的决心,对胜利充满希望的乐观自信构成了1938年武汉战时文学的主流,中国军民在敌强我弱的劣势环境下,表现出渴望战斗,渴望牺牲的崇高品质,在民族战争中凸显出大无畏英雄气概,是武汉抗战文学的显著特征。发表在《七月》三卷二期上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以凝重的写实笔法再现战争的庄严与残酷,表现战士们渴望战斗、渴望战死的顽强品质和牺牲精神,可歌可泣。1938年5月汉口大众出版社印行的《北运河上》,刻画了一群战地政训员的英雄形象,这群宣传抗日的政训员,违抗撤退的命令,高喊:“我们的血,要流在一起!”“我们要保卫祖国的寸土寸地!”

抗战初期武汉的戏剧、诗歌、通讯、报告、特写等也洋溢着誓死抗战的激情。《抗战文艺》一卷十二期《到胜利之路》是一出街头短剧,在抗战时期每天都真实地上演着这样的故事。通讯、报告、特写成为武汉战时文学的主潮。《七月》第二集特写有东平《叶挺印象记》、报告有奚如《运输员》、通讯有《陕北的延安》等。《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一至四号通讯有以群《台儿庄一勇士》、报告有鲁黎《在五一节兵工厂的晚会里》、特写有碧野《同志和农民们》等。

武汉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以小型化和通俗化的短剧为主,如《抗战文艺》第一卷的《出征》、《他

们在码头上》等。旧剧创作多是“旧瓶装新酒”，如老舍京剧本《忠烈图》，用京剧形式来宣传民众抗战。武汉抗战时期诗歌向街头诗、朗诵诗的方向发展。街头诗是以人民大众为对象，以具体的战争以及政治事件为题材，用浅白通俗的语言，题写在街头墙壁、传单上的诗歌。街头诗短小生动、泼辣爽直，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武汉抗战时期的小说如陈白尘发表于《抗战文艺》一卷七期的《慰劳》、丁行发表于《抗战文艺》二卷二期的《抽签》、萧军连载于《七月》的长篇小说《第三代》等。通俗文学期刊更受普通民众欢迎，《抗到底》第五期“抗日通俗文学专号”要目中有三字经、京剧、大鼓词、小调、数来宝、麻城调、民众抗战歌曲等，语言通俗浅显、内容生动实在、篇幅短小、形式灵活。这种贴近大众的表达方式便于民众熟悉与理解，切实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唐弢认为：“武汉三镇抗日歌声回荡，戏剧演出盛行，诗歌朗诵活动到处兴起，刊物如同雨后春笋，作者精神振奋。这是与当时政治上的新气象相适应的文艺上生气蓬勃的新局面。”^[1]

在抗战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文艺的本质是宣传，武汉抗战时期强调文学的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作用，与当时抗战严峻的时局紧密相关。《人同此心》是老舍在《抗战文艺》一卷一期上的一篇小说，写三个大学生在敌寇占领的城里开展武装抗日。其中的主角王文义说：“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洋车夫没有丝毫的分别，再从反面来说，不愿作亡国奴的也没有等级，命都是一样的。”旨在说明亿万中国人的心都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有义务抗日。

武汉抗战时期的诗歌显得朴实、激昂、大多是直抒胸臆而很少有精心营构的意象出现。如臧克家发表在《抗战文艺》一卷八期上的《送战士》：“……敌人破碎了我们的河山，/敌人烧焦了我们的家园，/敌人侮辱了祖宗的坟墓，/男杀女

奸，/天大的欺侮，/使我们不能开颜，/迎上战场，/堂堂七尺的男子!/用炮火去把耻辱洗净，/我们是哀兵……”此节诗歌几乎全是愤怒情感的倾诉，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老舍、穆木天、田汉等用旧剧、鼓词、小调等形式进行文学创作，如穆木天发表在《抗到底》第五期的《密山县日本强盗屠杀路工》(大鼓词)：“日本强盗占关东，/杀人放火逞凶凶，/退让丢掉东三省，/热河漆县一旦扔。大好河山归了强盗，四千万老百姓也就倾家败产受牺牲，/多少惨事押下且不表，单表表密山县屠杀路工/……”夏衍指出：“战争的烈火锻炼了中国人民和它的文化文艺工作者，中国文艺工作者也用他们的眼泪和血汗，谱写了一章章惊天动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的诗篇。”^[4]

在穆木天、高兰、冯乃超等人大力倡导下，诗歌朗诵活动广泛开展。汉口广播电台经常播出朗诵节目，不少大型集会前诗歌朗诵和歌曲演唱交叉进行。车站、码头、街口等群众聚集地也常举行朗诵会。诗朗诵活动的开展，使诗歌成了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武器。艾青《反侵略》、高兰《我的家在黑龙江》、田间《儿童节》等诗广泛流传，诗歌朗诵风靡江城。大批鼓舞抗日的诗作应运而生，高兰的朗诵诗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武汉“四·二九”空战前后，反映空军胜利的诗歌、小说、戏剧大量涌现，如艾青《这是我们的》、臧克家《伟大的空军》、穆木天《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姚雪垠《白龙港》、洪深《飞将军》等。台儿庄战役后，反映血战的报告文学有数十篇，以群《台儿庄战场散记》、范长江《台儿庄血战经过》、王西彦《被毁灭了的台儿庄》等广受欢迎。通俗文学创作十分活跃，作品大量产生，数来宝、莲花落、小曲、鼓词、顺口溜、演义故事等被改造利用，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工具。

抗战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文学。抗战初期的武汉文学，反帝的主题汇聚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焦点上，反对封建主义更多地是反对汉奸，反对卖国投降。

武汉抗战文学，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下，以一个地区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学运动，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第一、文艺组织的统一性和文学队伍的聚散性。武汉抗战文学组织统一，阵线宽广，阵容壮观，实力雄厚。抗战初期，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千余作家艺术家云集武汉，“全国文协”的成立是文艺界空前广泛大团结，大联合。第二、作品主题的传承性和文学风格的纪实性。抗战爆发，带来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是抗日斗争成为武汉文坛上压倒一切的主题。无论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以讴歌人民的抗战热情，颂扬忠勇的抗日将士，痛斥卖国的民族丑类为主旨。反帝集中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则集中到反汉奸的主题上。

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伴随着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武汉的抗战文学运动波澜壮阔，推动了全国抗战文学运动的蓬勃开展。对动员、组织、鼓舞人民的抗日斗争，起过极大的推动作用。武汉成了抗日民族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抗战文学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深刻揭露和对抗日英雄人物及其英雄事迹的颂扬，真实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顽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在抗战初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促进了前方官兵与后方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思想交融。

参考文献

[1]朱莉主编：《律动的足音——武汉博物馆展览解读》，湖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72页。

[2]章绍嗣等：《武汉抗战文艺史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4—5页。

[3]唐弢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页。

[4]夏衍：《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总序》，重庆出版社，1989年，6页。

(作者单位：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